

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石晓婧 杨荣珍

内容提要 反补贴调查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维护贸易公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对本国产业保护意识的增强,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成为受反补贴调查的重灾国,其中以美国发起的调查居首。文章基于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从其内在机制来讲,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对美国出口成本的增加,引发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以及融资约束的增强,但却激发了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这表现为企业降低对美国出口,而增加了对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的出口;其次,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最后,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尤其在对美国的出口上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虽然出口企业的数目有所减少,但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关键词 反补贴调查 贸易摩擦 企业出口 异质性 二元边际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DOI:10.13516/j.cnki.wes.2020.02.003

一、引言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但同时,自2004年遭遇第一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截至2017年12月共遭受了129起反补贴调查,占全球反补贴案件约三分之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大目标国。其中,美国是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WTO统计,截至2017年12月,美国对中国共计发起68起反补贴调查,占中国遭受反补贴案件的52.71%。反补贴与反倾销、保障措施并称为贸易救济措施,但不同的是反补贴调查涉及政府部门,其调查的对象包括政府补贴的政策和措施,会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乃至市场经济制度等,易产生连锁反应,并且其应对工作也更加敏感和复杂。因此,面临的形势也更加紧迫。在美国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愈演愈烈时,考察其对华反补贴调查产生的经济影响以及异质性企业受到影响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反补贴制度,根据规定,反补贴调查主要有两种发起方式,其一是调查机构主动发起,其二是由申请方代表国内产业提交申请,收到申请后商务部审查立案。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于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损害、商务部就补贴存在与否进行调查和初步认定,之后商务部做出终裁、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终裁,商务部再公布制裁结果,对于受到生产国奖励和补助的进口货物征收正常关税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新形式与潜在政策工具研究”(项目编号:18BGJ016)。

之外的反补贴税。根据 WTO 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美国对华发起的 68 起反补贴案件中,涉及最多的是贱金属及制品类(32 起),其次是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类(11 起)以及机械和电气设备(9 起),共计占 76.47%,其余涉及的 8 类产品均低于 5 起。从裁决结果看,肯定裁决比率达到 98.71%,征收的反补贴税率最高达到 620.08%(环状焊接碳素钢管案对天津双街集团),其中含有 100% 以上征税率的案件占比 67.65%。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于不应诉企业适用“不利事实、不利推定”原则确定反补贴率,即利害关系方在不能提供必要信息时,调查机构可以依据这一原则使得被诉方获得更为不利的裁决结果,从而导致反补贴率畸高。排除这类后正常的补贴税率在 0.3% ~ 65% 左右。除此之外,在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涉及了低于合理回报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问题,美国以国内市场扭曲为由拒绝适用国内价格计算补贴利益,人为提高反补贴率。在公共机构问题上,美国认定所有中国的国有企业均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的“公共机构”,认为其提供的所有货物和服务均为补贴,这些不当做法均导致了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的美国反补贴调查形势。

反倾销、反补贴是各国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但比较而言,学界对反倾销的规则研究和经济影响研究相对丰富和成熟,而对反补贴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还相对集中于规则研究,延伸至经济影响研究的相对匮乏。本文关注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即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出口额。从理论上讲,反补贴调查会使得被调查产品对美国出口成本上升,从而使经营绩效下降、融资约束加强。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出口的相对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反补贴调查可能使得企业转移市场战略,继而可能会表现为减少对于美国市场的出口,而增加对除美国之外市场的出口来弥补部分损失。鉴于外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拥有更好的应变能力(余淼杰,2011),在这种反补贴调查引起的市场冲击下会更快地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损失。并且,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多产品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的业绩水平(Goldberg 等,2010; Arkolakis 和 Muendler,2010),会更快地进行调整,加大对于其他市场的出口。此外,从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一部分企业可能通过退出市场减少亏损,而另一部分企业虽然留在市场内部,但出口额可能也存在一定调整。据此,我们预测在遭受反补贴调查后,企业出口额可能下降,而在对美出口下降的同时可能对其他非美国市场出口呈现上升趋势,且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面临的冲击相对较小,另外,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也可能产生差异性影响。

为了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本文基于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三个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就反补贴调查的出口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对比分析反补贴调查对于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企业面对反补贴调查时的差异性反应进行分析,并且扩展到出口的二元边际,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以期考察反补贴调查对出口产生的影响,为今后企业应对反补贴调查提供政策建议,并且弥补学术界对反补贴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存在的空白。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于贸易救济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这一类文献对本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反倾销调查对于出口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出口数量、价格、种类以及贸易转移的影响。

在对出口数量的影响上,多数文献达成了一致结论,即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数量大幅降低(White 和 Jones,2000; 王孝松等,2015; 蒋为和孙浦阳,2016; 张燕和车翼,2018)。唐宜红和张鹏杨(2016)则关注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动态效应,基于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数据采取双重差

分法实证研究认为,在短期内反倾销会对中国出口规模存在抑制作用,但在长期内不明显。除了进出口数量之外,Lu等(2013)还关注了出口的价格,使用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数据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虽然使得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大幅降低,但其价格却不受影响。龙小宁等(2018)关注出口的种类,并基于2000~2006年企业-产品的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他们认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受影响企业的非倾销产品对美出口,即认为存在出口种类的溢出效应。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向洪金(2008)通过构建一个“两国三地”的价格竞争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再运用2002~2007年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案件数据实证检验,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将导致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减少,呈现负向的贸易限制效应,同时也导致了韩国和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对美国出口增加,即存在着正向的贸易转移效应。谢建国和黄秋月(2014)关注这种贸易转移的持续性,基于1990~2011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数据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会导致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向世界其他国家转移,且这种转移具备持续性,但并不会影响中美贸易的长期失衡。

中国企业出口的产品受到国际反倾销调查最早始于1979年,但是遭受反补贴调查则从2004年开始,这一现实直接导致了相关的学术成果存在明显的差距。相比于反倾销研究,对于反补贴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初始阶段(杨荣珍,2015)。目前关于反补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法学视角的规则研究:一是从法学角度对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规则进行研究,Sykes(2003)对WTO规则补贴的内涵、Brou和Ruta(2012)对补贴的效应机制、Clarke和Horlick(2005)对补贴与产业损害认定及因果关系认定、甘瑛(2013)对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14条适用前提、李仲平(2015)对一般基础设施的法律判断标准、徐浩标(2017)和刘利平(2018)对反补贴外部基准、欧福永和罗文正(2019)对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的严重侵害实体规则等分别展开了法理分析。二是用案件分析的方法对相关案例进行研究,韩立余(2001)、龚柏华(2004)、朱榄叶(2005)、杨荣珍(2015)等均从不同角度对多个案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读。大多数的学者从单一案例分析切入具体分析补贴的相关规则,如杨荣珍(2012)对美国对华铝型材反补贴案、王朝才和王萌(2016)对美国对华2013年和2014年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案件的分析等。

也有部分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反补贴影响的问题,Zhu等(2008)预测了2020年前美国反补贴税对于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铜版纸进出口的经济影响,认为反补贴税并不会增加生产或改善净贸易;王华(2016)从出口产品、出口企业、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反补贴法对中国造成的影响;郑琦巧和王强(2018)则以美国对江苏铝型材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为研究对象,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对于反倾销调查产生的贸易影响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但是在反补贴调查的影响效应研究上,大多基于事实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突破空间,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首先,在选题上,以往大部分文献分析反倾销调查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以及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反补贴调查,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以此考察反补贴调查引致的经济效应;其次,在数据上,我们通过合并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构建更加详实丰富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反补贴带来的影响进行经验验证;再次,在内容上,我们在对反补贴造成的出口影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考察企业对美国市场和非美国市场出口变化情况,并且分析异质性企业在遭受反补贴调查时的差异性表现,另外,从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进行进一步扩展性探讨;最后,在方法上,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就反补贴调查的出口效应进行经验分析,以样本年间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作为外生冲击,采取倾向匹配得分的方法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

对比分析反补贴调查对于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1. 数据

本文通过将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①进行合并,形成高度细化的反补贴调查微观企业数据。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中国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所在省份、所属行业等基本信息以及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资产总计等财务信息,《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企业出口目的国、出口产品等年度贸易数据,我们借鉴 Ahn 等(2011)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两个数据库中相关企业的信息进行匹配并进行合并,形成工企 - 海关合并数据库。世界银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提供了 WTO 主要成员国反补贴调查的详细数据,包括调查案件号、发起人、被诉产品、调查时间、初裁时间以及终裁时间等信息。通过海关编码协调制度 HS6 位税号和年份将其与工企 - 海关合并数据库合并后,我们参考 Qiu 和 Yu(2014)的研究方法,剔除数据库中存在的不合理观测值,除此外,为保证本文样本中反补贴调查前后有足够的观察时间,我们还剔除了在 2007 年和 2013 年发起的案件。最后得到一个包含 2924 家企业共 25 916 个观测值的样本。

2. 匹配方法

本文采取倾向匹配 - 双重差分的方法对反补贴的出口效应进行分析,将反补贴调查作为事件的外生冲击,构造一个自然实验,以尽可能避免内生性问题在估计中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将在样本年份中受到反补贴调查的企业作为处理组,而在其他维度与其相似但未受到反补贴调查的企业作为对照组,通过 Rosenbaum 和 Rubin(1983)提出的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具体来说,我们首先用 Logit 回归在多个维度上得到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倾向匹配得分值,即 p_i 和 p_j ,然后计算并且选择两组之间距离最小的样本作为相应的对照组,即:

$$c(i) = \min_j \| p_i - p_j \| \quad (1)$$

在匹配维度的选取上,我们参考 Lu 等(2013)、王孝松和谢申祥(2009)、蒋为和孙浦阳(2016)的方法,将以下变量作为匹配变量:一是产品历史遭遇反补贴调查虚拟变量,即在 2008 年之前该产品是否遭受过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若是则取 1,否则取 0;二是美国反补贴调查剧烈程度变量,以美国当年对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目进行度量;三是美国特定产品反补贴剧烈程度,以美国在该产品上当年发起的反补贴数目度量;四是对美国的出口,采用对美出口额的对数值表示;五是当年的实际汇率。基于这五个维度,我们参考蒋为和孙浦阳(2016)的研究,采用 1:10 的比例对《全球反补贴数据库》中产品进行匹配,获得样本后通过年份及 HS6 位商品代码与工企 - 海关合并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本文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样本。具体来说,我们通过识别企业出口的产品是否遭受到反补贴调查来判断企业是否为被反补贴调查企业,即如果企业在反补贴案件发起前一年就出口该被诉产品,则其为调查组企业,而出口匹配产品的企业为对照组企业^②。

3. 模型设定

匹配得到本文样本后,我们采取双重差分的方法对两组样本的出口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参考龙小宁等(2018)的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以下模型:

$$y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ment_{it} \times Post_{it} + \beta_2 X_{it} + \alpha_i + \gamma_f + \mu_{it} \quad (2)$$

①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search_api_views_fulltext_op=AND&query=GCVD&nid=&sort_by=search_api_relevance&sort_order=DESC.

② 若企业产品受到多次反补贴调查,则以第一次为处理时间。

其中 f, t 分别代表企业和时间, 被解释变量 y_{ft} 表示企业对外出口总额的对数值、对美国出口总额的对数值、对非美国市场出口总额的对数值。 $Treatment_{ft}$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影响, 若是则取 1, 反之为 0。 $Post_{ft}$ 为反补贴调查事件虚拟变量, 若企业该年遭受反补贴调查则取值为 1, 反之为 0。 X_{ft} 为企业随着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α_t, γ_f 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 μ_{ft} 为随机扰动项。

4. 核心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额, 我们采用每个企业年度总出口额的对数值进行度量, 以考察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综合影响。参考龙小宁等(2018)的研究, 我们预测同反倾销相似, 由于反补贴调查会使得企业对美国出口的贸易成本增加, 所以其会抑制企业对美国的出口, 而这一理论机制也意味着企业可能会增加对非美国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即将贸易转移至低成本国家。为了验证这一机制, 我们加入企业对美出口额和企业对非美市场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进一步对反补贴调查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影响和反补贴调查时间这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定义如上文所示。

(3) 控制变量: 参考 Chandra 和 Long(2013)的研究,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进行控制, 分别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加 1 后数值的对数值和从业人数的对数值进行度量。同时, 由于生产率也是影响企业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Melitz, 2003), 我们采用人均产出进行度量控制。根据周大鹏(2014)的研究, 所有制是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我们按照企业注册登记类型将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加入控制变量。除此之外, 我们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reatment \times Post$	0.102		0.302		0.000		1.000	
	处理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总额(对数)	10.265	2.571	0.000	18.214	10.170	2.650	0.000	16.352
对美出口(对数)	11.605	2.467	0.000	16.994	11.233	2.642	4.500	15.719
对非美市场出口(对数)	10.513	2.522	0.000	18.214	9.991	2.610	0.000	16.352
企业年龄	2.291	0.492	0.693	4.357	2.434	0.590	0.693	4.489
企业规模	5.337	1.263	2.079	10.552	5.467	1.022	2.079	9.437
人均产出	12.830	0.815	9.956	20.062	12.395	1.047	1.371	17.031
是否外资	0.807	0.394	0.000	1.000	0.578	0.494	0.000	1.000
是否国有	0.766	0.423	0.000	1.000	0.505	0.500	0.000	1.000

四、经验结果分析

在进行本文的基准分析前, 有必要对于双重差分法的关键假设——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 这一假设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冲击前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对此, 我们将对照组和处理组企业的平均出口总额作为纵轴, 将遭遇反补贴调查时间及前两年和后三年作为横轴刻画两组出口额的变动趋势, 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中的垂直虚线表示反补贴调查的时间。可以发现, 在反补贴调查前两组企业的出口额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并且这两组上升趋势基本保持平行, 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反补贴调查之前不存在明

显的差异性。但在反补贴调查之后,虽然这两组企业的出口额均有所下降,但是处理组的企业明显比对照组企业的出口额下降强度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表明反补贴调查对于受调查企业的出口额存在显著的抑制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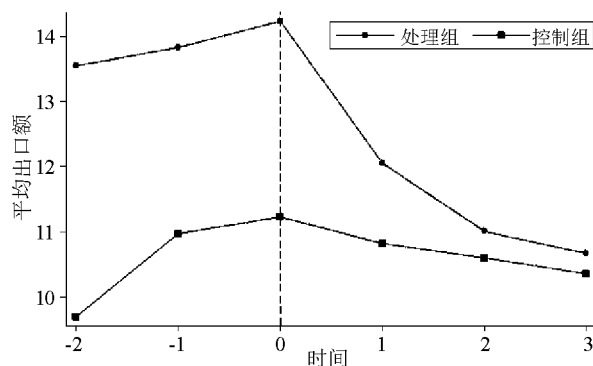


图1 受调查企业和未受调查企业出口额变化趋势

1. 基准结果分析

在平行趋势成立这一假设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实证考察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首先以企业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2第1列。我们发现与初步预测一致,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总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使得出口总额下降了31.3%。我们进一步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的猜测,即反补贴调查对出口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表现为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而增加了对于成本相对较低的其他非美国市场的出口,发生贸易转移。为了对其进行验证,我们分别将对美国的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的后两列。可以发现,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发生显著的减少,相反地,却增加了对于除美国之外其他市场的出口,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对于理论机制的猜测,同时也从侧面说明,虽然存在有部分企业将贸易转移到非美国市场出口的情况,但是仍然无法弥补反补贴调查所产生的负向冲击。

表2 基准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313 ***	(0.109)	-3.958 ***	(0.285)	0.351 ***	(0.116)
企业年龄	0.088 ***	(0.032)	0.384 ***	(0.088)	-0.050	(0.034)
企业规模	-0.005	(0.017)	0.139 ***	(0.500)	0.013	(0.018)
人均产出	0.295 ***	(0.017)	0.210 ***	(0.062)	0.280 ***	(0.017)
是否外资	0.123 *	(0.065)	0.757 ***	(0.131)	-0.603 ***	(0.076)
是否国有	-0.117	(0.074)	0.297 *	(0.168)	0.357 ***	(0.08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R-squared	0.029		0.155		0.034	

注: ***, **, *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2. 稳健性检验分析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控制组选择方法、样本非随机性和异常值、加工贸易厂商的存在以及同期反倾销调查对于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替换处理组、剔除样本异常值、加工贸易厂商以及“双反”调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考察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1) 替换控制组

前文在用倾向匹配方法得到样本时,将五个维度与处理组相似的产品作为控制组,如果改变控制组选取的方法是否会对本文的基准结果产生显著性的影响?为了考察这一问题,确保估计结果可靠,我们利用 Lu 等(2013)的方法重新构建对应的对照组,并基于本文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具体来说,我们将出口涉案产品所属的 HS4 位编码下所有未涉案 HS6 位产品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进行回归,同样地,我们采用企业出口总额、对美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我们发现,在替换了控制组之后所得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即基准结果并未由于对照组选取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出口总额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减少了企业对美国出口额,但是却增加了企业对于除美国之外其他市场的出口,基准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表 3 替换控制组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637***	(0.182)	-2.225***	(0.326)	0.202*	(0.106)
企业年龄	0.351***	(0.073)	0.881***	(0.151)	0.460***	(0.076)
企业规模	-0.154***	(0.033)	0.281***	(0.075)	-0.213***	(0.035)
人均产出	0.483***	(0.044)	0.957***	(0.112)	0.345***	(0.044)
是否外资	0.840***	(0.139)	-0.742***	(0.224)	0.870***	(0.155)
是否国有	0.410**	(0.163)	2.223***	(0.287)	0.151	(0.18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6726		1012		5714	
R-squared	0.067		0.370		0.066	

(2) 样本非随机性和异常值

考虑到本文的样本可能会存在非随机性和异常值,这将会导致基准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对样本通过剔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本文的基准结果是否因为异常值的存在而发生偏误。在样本处理上,我们把相应被解释变量即出口指标低于 1% 分位点和高于 99% 分位点的样本值进行剔除,用这一新的样本进行再估计。表 4 报告了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剔除了样本异常值之后,反补贴对企业出口总额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并且也进一步证实了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的出口贸易从美国市场向非美国市场的转移,这说明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表 4 剔除异常值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295***	(0.102)	-3.817***	(0.279)	0.926***	(0.089)
企业年龄	0.059**	(0.030)	0.426***	(0.086)	-0.175***	(0.026)
企业规模	-0.057***	(0.016)	0.139***	(0.049)	0.046***	(0.014)
人均产出	0.337***	(0.016)	0.210***	(0.061)	0.312***	(0.013)
是否外资	0.221***	(0.060)	0.782***	(0.128)	-0.907***	(0.058)
是否国有	0.199***	(0.069)	0.334**	(0.165)	1.231***	(0.06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940		3630		20086	
R-squared	0.038		0.161		0.063	

(3) 剔除加工贸易

中国出口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是独立于中国本国的生产体系的(林桂军等,2018)。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可能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影响表现出差异性,从而影响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为考察这一影响,我们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企业出口产品贸易类型数据,将加工贸易从样本中剔除得到新的样本,进行回归后得到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剔除了加工贸易之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旧保持稳健,即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总额产生的影响及产生的出口市场转移现象并未由于中国出口模式的独特性而产生显著差异。

表5 剔除加工贸易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428***	(0.0597)	-0.504***	(0.173)	0.829***	(0.114)
企业年龄	0.136***	(0.030)	-0.022	(0.088)	0.200	(0.032)
企业规模	-0.106***	(0.017)	-0.051	(0.049)	-0.101***	(0.017)
人均产出	0.338***	(0.016)	0.253***	(0.064)	0.336***	(0.016)
是否外资	0.145**	(0.061)	0.850***	(0.136)	-0.609***	(0.071)
是否国有	0.315***	(0.071)	0.396**	(0.175)	0.884***	(0.08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635		3635		20000	
R-squared	0.035		0.091		0.047	

(4) 剔除“双反”调查

美国对华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很多都是伴随着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发起,即同时发起了“双反”调查。为了检验本文基准结果是否受反倾销调查的影响,更精确地识别单纯发起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我们将样本中伴随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双反”调查样本值进行剔除,以此考察本文的基准结果是反补贴调查产生的还是伴随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我们发现核心系数仍然通过了1%的统计检验并且符号不变,这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受到影响,仍是成立的,即单独发起反补贴调查会对企业的出口总额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也使得企业出口市场发生了转移。

表6 剔除“双反”调查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936***	(0.0681)	-0.681***	(0.162)	0.250***	(0.0762)
企业年龄	-0.0617	(0.0536)	1.849***	(0.218)	0.204***	(0.0535)
企业规模	0.294***	(0.0163)	-0.362***	(0.104)	0.438***	(0.0202)
人均产出	0.510***	(0.0206)	-0.235*	(0.123)	0.712***	(0.0215)
是否外资	-4.920***	(0.0825)	2.229**	(0.928)	-3.048***	(0.0857)
是否国有	5.257***	(0.0880)	-0.643	(0.943)	4.334***	(0.058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882		968		6874	
R-squared	0.561		0.382		0.574	

3. 进一步机制验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出口的成本提高,从而表现为企业对美国

出口减少而增加了对成本相对低的其他市场的出口。在此,我们对其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验证,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我们认为同反倾销类似,企业被征收反补贴税后的出口成本增加会减少企业的盈利(Egger和Nelson 2011),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所下滑,出现出口负向冲击。其次,成本的提升影响企业资金流动,并且绩效的下滑如同一个信号,导致企业的融资能力迅速下降,从而增加企业出口面临的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出口(蒋为和孙浦阳 2016)。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企业出口,尤其是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但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企业可能会发生战略调整,通过转移市场等方式减少在美国市场上所遇到的冲击。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融资约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现为企业出口的下降,但是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调整战略以应对损失,企业市场战略的调整覆盖了由于经营绩效下降和融资约束加强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减少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们采用总资产收益率度量企业的经营绩效,采用SA指数(Hadlock和Pierce 2010)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①,采用市场多元化(市场数)度量企业的战略调整。我们将这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考察反补贴调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见表7。我们发现,反补贴调查显著地降低了总资产收益率并提高了SA指数以及市场多元化程度,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这表明反补贴调查引起的对美出口成本增加,恶化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加大了融资约束,但是促使企业采取策略积极调整出口市场,以应对反补贴调查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7 进一步机制验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122 ***	(0.012)	5.672 ***	(0.684)	0.024 ***	(0.004)
企业年龄	0.053 ***	(0.003)	26.280 ***	(0.197)	0.003 *	(0.002)
企业规模	-0.018 ***	(0.002)	2.769 ***	(0.103)	0.021 ***	(0.001)
人均产出	-0.023 ***	(0.002)	0.955 ***	(0.104)	0.018 ***	(0.001)
是否外资	-0.029 ***	(0.007)	0.241	(0.404)	0.004	(0.004)
是否国有	-0.045 ***	(0.008)	-0.998 **	(0.459)	-0.019 ***	(0.00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86		25386		25386	
R-squared	0.050		0.480		0.105	

4. 异质性分析

反补贴调查会对企业的出口总额以及对美国和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产生影响,那么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或者是单一产品与多产品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异质性的表现,我们接下来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

(1)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补贴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两类企业在资本构成、公司治理以及政府的补贴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应该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其一,外资企业受到利润率的强烈驱动,其可能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调整产品的结构,同时拥有相对更快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余淼杰 2011);其二,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体系不完善,管理者对企业绩效关注不足(田利辉和张伟 2013),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相对较差,但同时,国有企业规模较大,获得的政府准入优惠政策和关键要素资源配置的偏向相对较多(张杰等 2013);其三,中国的私营企业以中小规

^① 孙雪娇等(2019)的研究表明,SA指数法不包含内生变量,可以避免现金流指数、KZ指数、WW指数的测度偏误,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模为主,应对市场变化能力较弱。因此我们预测,相对来说外资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可以较快地做出应变,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冲击相对较小,而国有企业虽然应变能力相对较差,但其在政府的支撑下可以转向非美国市场出口,总的出口额受到的冲击相对民营企业小,即在总出口上受到冲击的程度为:外资企业 < 国有企业 < 民营企业。但具体到美国反补贴的情境下即对美国出口表现上,这个排序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在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规定,其受到的制裁更严厉,因此在对美出口上的冲击表现为:国有企业最为严重,外资和民营企业相对较低。自然,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外资和国有企业可能会出现显著的转移,而民营企业则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通过转移市场出口弥补反补贴对美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们按照企业的注册登记类型将企业划分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个样本,对企业出口总额的变化情况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8。我们发现,相对来讲在外资企业样本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同时在国有企业样本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对于民营企业样本下估计系数更小,这与我们的预测保持一致。

表 8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1

样本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i>Treatment × Post</i>	-0.161	(0.121)	-0.398***	(0.125)	-2.951***	(0.661)
企业年龄	-0.276***	(0.039)	-0.443***	(0.040)	0.678***	(0.054)
企业规模	-0.063***	(0.019)	-0.071***	(0.020)	0.151***	(0.033)
人均产出	0.295***	(0.020)	0.285***	(0.021)	0.240***	(0.02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495		13705		9808	
R-squared	0.049		0.060		0.059	

我们就不同所有制企业对美国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额的变化进行估计以考察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总额影响的理论机制。估计结果见表 9,我们发现在对美国出口额的影响上,三类企业均受到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其中国有企业的冲击最为严重。但是在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影响上,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表现出了贸易的转移,而民营企业仍受到负面冲击,这解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总额受到反补贴调查冲击程度不同的原因。同时,与我们上文的分析大体一致,外资企业的应变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撑使得这两类企业的冲击相对民营企业更小一些。同时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企业应变能力对缓解反补贴调查影响的重要作用。

(2) 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根据 Goldberg 等(2010)、Arkolakis 和 Muendler(2010)的研究,多产品的企业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而言,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并且绩效水平更好。蒋为和孙浦阳(2016)在研究反倾销调查时发现,反倾销调查对于多产品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小,类似地,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也存在同样的差异性影响,生产多个产品的企业相对来说产品种类调整余地更多并且人员设备等更加完善(龙小宁等,2018),并且多产品企业也可能通过非调查产品补贴调查产品的部分损失(Lu 等,2013),从而更容易应对调查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我们预测多产品企业受到的反补贴调查冲击相对单一产品更小。为验证这一想法,我们统计每个企业出口的 HS6 位产品编码种类,仅出口一种产品的定义为单一产品企业,出口多种产品的定义为多产品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前两列以企业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发现单一产品企业的出口总额受到了反补贴调查的冲击,出现显著的下降,而多产品企业并未表现出负向的冲击。为进一步考察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在第 3 列、第 4 列和后两列中采用企业对美出口额和对非美市场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在对美国出口额的影响上,无论是单一产品企业还是多产品企业

均由于反补贴调查而出现了出口下降,但比较而言,多产品企业的下降幅度低于单产品企业。而在对非美国市场

表 9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2

样本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被解释变量: 对美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2.545 ^{***}	(0.318)	-3.546 ^{***}	(0.312)	-2.505 ^{***}	(0.230)
企业年龄	-0.184 [*]	(0.105)	-0.870 ^{***}	(0.106)	1.682 ^{***}	(0.109)
企业规模	-0.137 ^{**}	(0.054)	0.044	(0.056)	1.702 ^{***}	(0.101)
人均产出	0.809 ^{***}	(0.061)	0.558 ^{***}	(0.073)	0.032	(0.10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18		1801		1241	
R-squared	0.264		0.329		0.511	
被解释变量: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620 ^{***}	(0.126)	0.395 ^{***}	(0.132)	-3.073 ^{***}	(0.660)
企业年龄	-0.506 ^{***}	(0.042)	-0.581 ^{***}	(0.044)	0.767 ^{***}	(0.059)
企业规模	0.010	(0.020)	-0.009	(0.022)	0.035	(0.035)
人均产出	0.244 ^{***}	(0.021)	0.189 ^{***}	(0.022)	0.323 ^{***}	(0.02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077		11904		8567	
R-squared	0.069		0.066		0.070	

的出口上,多产品企业的出口出现了显著的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总额表现出了上涨,但单一产品企业出口调整程度不够,从而表现为企业出口总额的下降。

表 10 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样本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单一产品	多产品	单一产品	多产品	单一产品	多产品
<i>Treatment × Post</i>	-0.553 ^{***}	9.785 ^{***}	-3.904 ^{***}	-2.636 ^{***}	0.235 [*]	4.766 ^{***}
	(0.119)	(1.013)	(0.256)	(0.433)	(0.130)	(1.383)
企业年龄	-0.057 [*]	-1.411 ^{***}	-0.403 ^{***}	2.068 ^{***}	-0.097 ^{***}	-3.750 ^{***}
	(0.032)	(0.254)	(0.0826)	(0.222)	(0.035)	(0.546)
企业规模	0.062 ^{***}	-0.696 ^{***}	0.313 ^{***}	0.113	0.051 ^{***}	0.732 ^{***}
	(0.018)	(0.077)	(0.049)	(0.084)	(0.019)	(0.162)
人均产出	0.331 ^{***}	-0.453 ^{***}	0.392 ^{***}	0.694 ^{***}	0.290 ^{***}	-0.170
	(0.017)	(0.114)	(0.059)	(0.243)	(0.017)	(0.209)
是否外资	-0.451 ^{***}	6.155 ^{***}	-1.343 ^{***}	6.978 ^{***}	-0.640 ^{***}	3.677 ^{***}
	(0.068)	(0.148)	(0.143)	(0.223)	(0.078)	(0.362)
是否国有	0.304 ^{***}	-4.586 ^{***}	2.611 ^{***}	-3.601 ^{***}	0.365 ^{***}	0.788
	(0.078)	(0.189)	(0.193)	(0.323)	(0.086)	(0.57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102	1288	2971	691	21131	597
R-squared	0.034	0.706	0.227	0.896	0.034	0.593

5. 扩展分析——基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前文从企业贸易发生转移的角度分析了反补贴调查造成企业出口总额下降的内在机制,本部分我们进一步扩展,从出口的二元边际来考察企业出口额的减少是由于出口企业数目的减少(广延边际)还是现存企业出口额的减少(集约边际),亦或是二者均减少引发的?对美国和非美国市场出口额的变化是否也有出口企业数目和出口额的不同变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出口企业的数目以及现存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角度进行解释。

首先,从广延边际出发,采用出口企业数目、对美出口企业数目以及对非美国市场出口企业数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1。我们发现反补贴调查导致了市场中企业数目显著减少了415%,无论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还是对于非美国市场出口的企业数目都表现出负向抑制影响,即从广延边际来看,反补贴调查导致部分企业退出市场,从而使市场中现存企业数目减少。

表11 从广延边际出发的扩展分析

被解释变量	出口企业数目		对美出口企业数目		对非美市场出口企业数目	
<i>Treatment × Post</i>	-4.150***	(0.034)	-3.784***	(0.097)	-4.223***	(0.036)
企业年龄	0.018*	(0.010)	0.157***	(0.030)	-0.022**	(0.011)
企业规模	0.056***	(0.005)	0.201***	(0.017)	0.049***	(0.005)
人均产出	-0.052***	(0.005)	0.116***	(0.021)	-0.067***	(0.005)
是否外资	0.052***	(0.020)	0.150***	(0.044)	0.025	(0.023)
是否国有	-0.471***	(0.023)	-0.456***	(0.057)	-0.496***	(0.02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R-squared	0.690		0.640		0.707	

其次,从集约边际出发,采取续存企业出口额对数值、对美出口额对数值以及对非美国市场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见表12。可以发现,反补贴调查导致续存企业出口额下降了31.3%,在对美国的出口额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抑制作用,下降了395.8%,而在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上却表现出了显著上升的趋势,即从集约边际来看,反补贴调查引致了续存企业出口额的下降,尤其是对美国出口额的下降,相反地却增加了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

表12 从集约边际出发的扩展分析

被解释变量	续存企业出口额		续存企业对美出口额		续存企业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i>Treatment × Post</i>	-0.313***	(0.109)	-3.958***	(0.285)	0.351***	(0.116)
企业年龄	0.088***	(0.032)	0.384***	(0.088)	-0.050	(0.034)
企业规模	-0.005	(0.016)	0.139***	(0.050)	0.013	(0.018)
人均产出	0.295***	(0.017)	0.210***	(0.062)	0.280***	(0.017)
是否外资	0.123*	(0.065)	0.757***	(0.131)	-0.603***	(0.076)
是否国有	-0.117	(0.074)	0.297*	(0.168)	0.357***	(0.08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R-squared	0.029		0.155		0.034	

综合以上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出发的经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抑制性作用表现为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双方面降低,其对企业出口造成的影响是两

方面的,部分企业面临调查选择退出市场,而坚持在市场中的企业则由于调查带来的冲击降低了出口额。其次,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对美出口企业数目的减少和续存企业对美出口额的下降。美国对华反补贴导致对美出口成本的提高,进而导致企业退出市场或者减少对美出口。最后,前文研究的企业对于非美国市场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增长,反补贴调查同样导致了一部分脆弱企业退出对外出口,但是留存下来的企业转向对其他国家进行出口,并且增加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补贴调查带来的负向冲击。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的合并数据,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确定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就美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讨论,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同时本文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分析,随后对于不同所有制、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面对反补贴调查的差异性进行了考察,最后从出口二元边际角度展开讨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抑制影响。从其内在机制来看,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导致企业出口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经营绩效下滑、融资约束增强,但是激发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表现为企业对美国出口额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而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市场则提高了出口。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反补贴调查的反应存在差异性,其中外资企业所受到的冲击最小,表现在对美出口虽然下降,却显著增加了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第三,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来说,多产品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这类企业转而向非美国市场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第四,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来看,反补贴调查导致了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双方面降低,尤其是在对美出口上却表现出大幅下降,但是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却表现为出口企业数目的减少,而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尤其现在表现得更为激烈。反补贴调查作为一直以来贸易救济措施的重要手段,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得出结论为中国企业应对反补贴调查、减少反补贴措施带来的负面冲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企业应该建立并强化内部战略调整机制,在面对国际冲击时能够及时做出市场战略调整以减缓损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该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效应对贸易环境变化,积极应对反补贴调查。单一产品的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以扩展产品的种类,从而能够在遭受反补贴调查时调整产品,稳定企业的出口,减少反补贴对于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企业应当从自身出发,通过创新产品、扩大产品种类、增强企业面对国际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战略调整能力,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反补贴调查的冲击,保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Ahn J. B., Khandelwal A. K., Wei S. J..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 0-85.
- [2] Arkolakis C., Muendler M. A..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Exporting Products: A Firm-level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 [3] Brou D., Ruta M.. A Commitment Theory of Subsidy Agreemen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13(1): 239-270.
- [4] Clarke P., A., Horlick G., N..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J]. *Springer US*, 2005.
- [5] Chandra P., Long C.. Anti-dumping Du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Exporters: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51(4): 169-186.
- [6] Egger P., Nelson D.. How Bad is Antidumping?: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Discussion Papers*, 2011, 93(4): 1374-1390.
- [7] Goldberg P. K., Khandelwal A., Pavenik N., et al..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Turnov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 India[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10, 92(4): 1042-1049.
- [8] Hadlock C. 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 1909-1940.
- [9] Lu Y., Tao Z., Zhang Y.. How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91(2): 290-300.
- [1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11] Qiu L. D., Yu M.. Multiproduct Firms, Export Product Scope,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Role of Managerial Efficienc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 [12] 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 41-55.
- [13] Shushuai Z., Jamesa T., Joseph B.. Long-term economic impact of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oated free sheet paper im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Indonesia. [J]. *Forest Products Journal*, 2008, 58(10): 71-77.
- [14] Sykes A., O.. The Economics of WTO Rules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3, 1.
- [15] White, Y., K., Jones. The Sunset on US Antidumping Orders[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4(3): 591-611.
- [16] Zhu S., Turner James A., Joseph B.. Long-term economic impact of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oated free sheet paper im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Indonesia[J]. 2008, 58(10): 71-77.
- [17] 单一. 反补贴措施的司法审查[J]. *法律适用* 2007(06): 42-44.
- [18] 甘瑛.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4条的适用前提之辨——以对外贸易补贴利益与数额计算基础即“市场”为核心[J]. *政治与法律* 2013(11): 87-97.
- [19] 龚柏华. WTO 案例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20] 韩立余. WTO 案例及评析[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21] 蒋为, 孙浦阳. 美国对华反倾销、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绩效[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7): 60-77.
- [22] 李仲平. 反补贴中“一般基础设施”的法律判断标准探析——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视角[J]. *法学家* 2015(6): 25-36 + 173-174.
- [23] 林桂军, 王聪, 何昕. “双反”调查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来自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的经验证据, 工作论文.
- [24] 刘利平. 反补贴外部基准的市场扭曲认定及因应对策[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8(6): 16-19.
- [25] 龙小宁, 方菲菲, Chandra Piyush.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探究[J]. *世界经济* No. 477, 2018, 41(5): 78-100.
- [26] 欧福永, 罗文正. 试析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严重侵害实体规则[J/OL]. *时代法学*: 1-9 [2019-03-28]. <https://doi.org/10.19510/j.cnki.43-1431/d.20181114.012>.
- [27] 唐宜红, 张鹏杨. 反倾销对我国出口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11): 33-46.
- [28] 田利辉, 张伟.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J]. *经济研究*, 2013(11): 71-86.
- [29] 王朝才, 王萌. 从反补贴案例看我国企业财政补贴制度的改革[J]. *财政科学* 2016(3): 40-61.
- [30] 王华. 美国反补贴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价格月刊* 2016(1): 41-43.
- [31] 王孝松, 谢申祥. 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 2009(12): 47-51.
- [32] 王孝松, 翟光宇, 林发勤.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J]. *世界经济*, 2015(5): 36-58.
- [33] 向洪金. 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0): 75-86.
- [34] 谢建国, 黄秋月. 反倾销与中国的出口损害——基于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案例数据的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2): 41-47.
- [35] 徐浩标. WTO 反补贴问题探究——以外部基准为视角[J]. *法制博览* 2017(9): 227 + 226.
- [36] 杨荣珍. 国外对华反补贴案例研究[M].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 [37] 杨荣珍. 美国对华铝型材反补贴案评析[J]. *对外经贸实务* 2012(4): 72-76.
- [38] 余森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1(4): 1251-1280.
- [39] 张杰, 刘元春, 郑文平. 为什么出口会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 ——基于政府行为的考察[J]. *管理世界* 2013(6): 12-27 + 187.
- [40] 张燕, 车翼. 发展中国家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以印度为例[J]. *世界经济文汇*, 2018(1): 44-67.
- [41] 郑琦巧, 王强. 江苏省铝型材遭遇美国反补贴调查的现状、影响及对策[J]. *对外经贸* 2018(1): 28-30.
- [42] 周大鹏.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估及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9): 81-86 + 89.
- [43] 朱榄叶. 政府与企业共同面对——中国面临的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研究[J]. *国际贸易* 2005(4): 37-40.

(责任编辑: 朱 颖)

Contents & Abstracts

China's Aid to Africa and Dual Marginal of Its Exports to African Recipient Countries

Sun Churen Liang Jingjing Xu Jinqiang Huang Lei(3)

This paper applies the dual marginal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specific impact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on China's exports to African recipient countries using the "BACI Bilateral Trade Data" , "AidData China-to-Africa Aid Data" ,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WDI) Database" and "UN Vote Data" from 2000 to 2013.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a's aid to Africa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ort of Chinese products to Africa , mainly by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Further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shows that China's aid to Africa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African countries ,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export of Chinese products. These results implies that China's aid to Africa will not only improve the welfare level of African countries , but also promote China's export. The aid to Africa achieves a "win-win" situation , which helps buil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mport Competition , Exit and Entry of Firm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uang Lijiang(19)

With the higher level of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 import competition induced by trade liberaliz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force affecting firm's exit and entry , and in tur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 we first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the exit and entry of firm and finds that import competition is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the exit of firms that have lower productivity and smaller size , but doesn't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entry of firm. Secondly ,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and firm turnover on the productivity of surviving firms , we find that both import competition and firm turnov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surviving firms. Finally , based on DOP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to break down aggregate increases in productivity , we also examine the industry-level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changes. We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import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due to the exit of unproductive firm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 from both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 , increased import competition has an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eliminating the least efficient firms and increasing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US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on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s

Shi Xiaojing Yang Rongzhen(33)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maintain trade equity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 However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each country to protect its own industry ,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 has become the major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 China has also become a suffering country under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 , among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first. Based on the micro-enterprise data formed by the merger of "China Industry Business Performance Database" ,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nd "Global Countervailing Duties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3 , this paper adopt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stud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US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We find: first , the US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 against China has curbed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From its internal mechanism , the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export cost of enterprises to the United States , which led to a decline in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an increase in financing constraints , but stimulated enterprise marketing strategy adjustment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ewer export of enterprises to the US and the increase of ex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low relative costs. Second ,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multi-product enterprises are relatively less affected by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Finally , from the dual margin of enterprise exports ,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have led to a decline in both the number of exporting companies and the export value of surviving enterprises , especially in exports to the US , and for the non-US market , although the number of export enterprises has de-

creased, the surviving enterprises have increased the export value of their products.

Asymmetric Impact of RMB Real Exchange Rate on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NARDL Model

Ma Dan Chen Zilu(47)

This paper divides exchange rate into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exchange rate level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nd examines their impact on income inequalit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decomposes the horizontal variables of exchange rate into two parts: the cumulative sum of positive changes and the cumulative sum of negative changes. Based on the asymmetric perspective, the NARD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asymmetric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income inequa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hort-term appreciation of RMB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domestic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impact of depreci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run,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will worsen domestic income ine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impact of depreciation is very limited. (2) The short-term small fluctuation of RMB real exchange rate can improve income inequality, but the long-term fluctuation of RMB real exchange rate, i. e. excessive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will worse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is sense, maintaining the reasonable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market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flexibility of RMB exchange rate to a certain extent will help to improv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ong run, only maintaining the basic stability of RMB exchange rate at a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level can improve domestic income inequality.

Spillover Effect and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RMB Exchange Rate and Inflation

Yang Xiaojun(59)

Based on VAR model, GARCH-BEKK model and DCC-GARCH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verage spillover effect,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 and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RMB exchange rat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infl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1) There is only a unidirectional spillover effect of RMB exchange rate on PPI inflation in the aspect of average spillover effect; (2) For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ARCH type spillover effect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PPI inflation, the exchange rate has a unidirectional GARCH type spillover effect on CPI inflation and PPI inflation, and CPI inflation also has a unidirectional GARCH type spillover effect on PPI inflation; (3) For dynamic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MB exchange rate, CPI inflation and PPI inflation has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but i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most periods. Therefore, the policy authorities should steadily promote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form further and take some measures to prevent excessive fluctuations in the RMB exchange rate,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policy goal of curb inflation and maintain price stability by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exchange rate.

Cross-border M&A Experience, Nature of Firm and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of Cross-border M&As

Zhao Junli Tong Fei(71)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LOF)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This paper studies impact of cross-border experience of M & A and the nature of fir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F and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s, usi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of M & A,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dustries of the enterprises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319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3 to 2015, the paper buil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M&A performance and then makes the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LOF caused by regulation legitimacy deficit has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s. Second, the experience of cross-border M&As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OF on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s. Third, The negative contribute is significant in private enterprise but not significant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 The effect of LOF on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As is significant in manufacture industry, but not significant in service industry.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Binary Margins of Corporat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Yang Lianxing Zhang Fang Zhang Hao(83)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the previous studies often ignor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ODI. By build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and the binary margins of ODI, we find some comprehensive results. First, financing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suppress the binary margins of ODI. This inhibiting effect is